

25.05

綏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綏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组 编

91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绥江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编 辑 组 编

1991年12月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

编辑：绥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组
地址：云南省绥江县
印刷：宜宾县印刷厂

2053/05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编辑组

责任编辑：王家杰

编 辑：蒋有才 康仕明 苟悦梁
 赵成仁 牟玉森

校 对：龚咏棠

内 部 资 料

邮政编码：657700

1991年12月

· 目 录 ·

历尽劫波迈上光明道·····	王 韵 (1)
燃烧在绥江的星星之火·····	姚鹤图 (13)
岳阳、珠江、闽江三部队会歼 土匪解放绥江概述·····	文史办 (18)
夫人坝围歼陈超残匪记闻·····	黄恒章 (31)
粉碎“碉上暴动”阴谋亲历记·····	张光智 (33)
发展中的绥江一中·····	龚尚茂 (37)
中城二小和绥江三中·····	郭长英 (41)
绥江解放后第一期师训班的概述·····	季金镛 (46)
大胆尝试实现“零”的突破·····	陈绍奎 (50)
回顾绥江县医院西医、外科发展概况·····	陈锡时 (52)
绥江县227例儿童死亡的回顾调查·····	吴锡枫 (57)
绥江对私改造概述·····	方在光 (64)
绥江县工商联的历史作用·····	张长龄 (69)
记忆中的绥江“工商联筹会”·····	罗宗尧 (74)
忆工商界朋友几件事·····	张长龄 (76)
创办会议供销社的回顾·····	季金镛 (78)
绥江储蓄发展概况·····	韩 翰 (81)
绥江航运发展概况·····	绥江航务志编写组 (86)
绥宜航道话今昔·····	凌发启 (92)
绥江解放前夕成立的第一个农会组织 ——回望农民“互助会”·····	李学常 (94)
谭善详将军轶事·····	萧星壁 (101)

训长子家骅·····	谭友佛遗稿 (105)
绥江教育界的先驱——钟灵·····	县志办 (108)
纪念杨绍廷烈士殉难41周年·····	张光智 (112)
回忆毛主席塑像塑造的经过·····	龚尚茂 (115)
历史上绥、永两县边界的变迁·····	陈泽文 (119)
甲子年绥江洪灾记闻·····	朱明先搜集 (122)
罕见的大象鱼·····	谢永强口述 朱明先整理 (124)
来函照登·····	(126)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文史委 (130)
绥江县政协第三届漏列、增补委员名单·····	(132)
《绥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勘误·····	文史办 (133)

历尽劫波近上光明道

· 王 端 ·

苦难的童年

我原名王家华，1920年10月诞生在云南省绥江县一户破落地主的家庭。祖籍原在四川省屏山县平夷司，我们是平彝正长官司王元寿的后代。明、清以及民国，凡几百年，王家于斯土生息繁衍，到我祖父那一代，就已经发展到几百户了。几百年来，族内的两极分化也较为明显，有的人家“锦衣玉食”，有的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祖父临终，给他的三个儿子遗留下51石租谷的田地和绥江县城文昌楼的一所住宅。三子均分，我父亲分得17石租谷的田地和文昌楼的两间住房，我们家即生活于此。

我母亲生育我们弟兄姐妹八人，除开五哥家广生下地就过继给堂伯父外，其余一家九口，生计十分困难。迫不得已，我父亲乃到四川当兵，寻求出路。家务就全靠母亲一个人撑持，后来由于医药、卫生、营养等种种因素，同胞相继夭折，最后只剩下四姐、五哥和我，五哥又在堂伯父家，我们母女三人苦熬着，相依为命，一心指望父亲的好消息。那知，我刚三岁那年，却盼来了父亲病逝成都的噩耗。一家人悲痛之余，母亲只得典当部份田地，把父亲的尸体运回故土安葬。这样，真如雪上加霜，家境就尤为困苦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摆诸我们家的遭遇，恰如其份。1925年，五哥不堪堂伯父家的嫌弃，愤而跑去屏山亲戚家，意外地参加了徐经邦领导的农民暴动，事败，不敢回

家，流落宜宾。母亲只有这根“传宗”的独苗，怎不着急呢，乃请人去宜宾寻找，五哥倒是回来了，可是找他的人却暴死途中。为了“赔命价”，母亲又将所余几石租谷的田地全部典出。从此，彻底破产了，家贫如洗。母亲、姐姐熬更守夜地做针线活计，卖点“针头线脑”，勉强撑持着一家人半饥不饱的生活。在那种社会里，我们家被歧视，受欺凌，连同院住的嫡亲叔、婶，也不把我们当人看待，经常借故指桑骂槐地讥笑我们，辱骂我们。母亲说，我们为了“息事宁人”，更是为了要保持精力去谋求生计，只能是笑骂由他了。

1928年，五哥在屏山县城读高小，因发动罢课，反对校方，被斥退。即此再去宜宾，而后浪迹四方了。绥江社会上风传着他是共产党的舆论，母亲痛苦难言。1934年他突然回到绥江，随着领导了“反选运动”。其时，我虽然不懂得什么，但暗自佩服他有能耐，敢和地霸斗争，替我们家也出了一口怨气。一家人正庆幸团圆，然而好景不常，反动派正酝酿着逮捕他的阴谋，于是再度被迫出走。临别时，母亲、姐姐泣不成声、我幼小的心灵遭受到了严酷的打击。仔细想来，我的童年确实是在苦难中度过的。其实又何只此，可以说迄至绥江解放前夕的1950年上半年，我们家都是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后来我又想，这样对我也是好事，磨练了我的意志，从而在革命征程中经受住了若干次严峻的考验。

艰辛的求学历程

根据当年的社会环境和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我要进校读书，简直是非份之想，可是，奇迹出现了，多亏了我的慈祥的母亲。她老人家虽一字不识，但却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她和姐姐省吃俭用，千方百计都要供我上学。有次，家里已

经揭不开锅了，剩下两个铜板，也给我买把带到学校去吃。而今思及，感慨万千！内心深处不由得产生了“母爱伟大”的崇敬挚情。由于穿着破烂，在学校常被一些同学歧视，班上丢了什么，首先怀疑到的就是我。记得一次，几个地主的小姐掉了砚台，商量要用水碗中竖筷子的迷信方式来嫁祸于我，幸得有正义感的同学们及时报告了校长（记得是杨华英），将她们训斥了一顿才平息了风波，而我却痛哭了一场。

1935年夏末，高小毕业。为了减轻母亲和姐姐的负担，秋初，我毅然考入了本县举办的“简易师范科”，希望在学习一年毕业后，当上一名小学教员，缓解家庭的困境。可是事与愿违，1936年夏毕业，却以我是“赤色份子”王家广的胞妹而不予分配。我很愤慨，同时也感到步入了绝境，曾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此时五哥从成都来信劝勉，并寄来巴金的名著《家》，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它给了我启迪和力量，消除了杂念，暗下决心要像觉慧一样，拼弃黑暗，追求光明。曾请求母亲陪送我去宜宾走亲戚，藉以打听能否找到什么工作或进一所免费的学校。适逢一护士学校招生，但要交30块银元的学费。天哪！我们那来这许多钱，只得灰溜溜地回家了。过了不久，我的一个堂姐从自贡归宁，她的丈夫是警官，沿途有人“保镖”，很安全。我恳求母亲向人借钱给我作路费，同堂姐一道去了自贡，住在她家，寻找就业机会。可是我的这位堂姐居心不良，劝我嫁给她们的勤务兵，把我肺都气炸了。趁她不备，在一个黄昏时候带上简单行李，坐上一辆黄包车逃走，而后搭乘货车，辗转到了成都。

到成都后，暂时寄寓在五哥的朋友也是同乡吕汝熹的家里，由他帮助找到了五哥另一好友于宏黎（中共党员）。于告诉我，五哥以共党嫌疑被关进了松潘监狱，当时，有如五

雷轰顶，我几乎昏倒。于安慰我说，你哥的事，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好在他只是嫌疑，反动派并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叫我留在成都读书，学食费由他设法筹措。1937年，我考入私立成公中学。抗战爆发，成都是大后方重镇，日寇飞机常来轰炸，天天跑警报，读书也不安宁，反动派还要搞磨擦，更使人愤慨填膺。由于吕家搬家，我是三易其居才读完一个学期。于宏黎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市政府的一个小职员，有限的收入还要供养母亲，在那“米珠薪桂”的年月，就无力再负担我的费用了，建议我停学回乡。我怎能走回头路呢？不免伤心大恸。后来他也觉得回家不是善策，考虑决定送我到崇庆县廖浩然家去，廖是五哥在松潘的同事，曾到成公中学看过我。

1938年1月，我乘滑竿去崇庆，黄昏时才到县城，向一位大婶打听，离廖场还有20多里，她见我进退两难，又听我是异乡口音，便自我介绍说她姓雷，就在附近坐家，单身姑娘出门不易，劝我去她家住宿，明天再去廖场。我见她慈眉善目，说话和气，暗自庆幸，遇上了好人，便欣然应允。到她家见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后来却是我在崇庆女中的同学，因此成了好友，节假日，我常去他们家，我逃避“三青团”照相，就是躲到这儿的。

第二天，到了廖家，廖已返任。他的妻子很贤惠，有个老母，三个子女，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很感动，也很自觉。打起精神抢作家务活计，廖家嫂子益发喜欢我了。对我说：“你去县城读书，学食费，我会设法解决，不用愁。”2月，我入崇庆女中11班就读。该校是春季招生，我跳了一个学期读二年级，我发奋补课，不久就赶上了进度。我爱读报，每天课余饭后，都要在报栏前站上较长的时间，这本来

是平常事，但似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我觉察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的行动，我的信也被偷拆过。这时五哥已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丢了“乌纱”（保安中队长），住在成都。经常给我写信和寄书报。记得有封信上他鼓励我说：“我们的母亲孤独一人（四姐嫁到屏山，此时已去世）在家，固然困难，但别忘了我们中国还有千百万个更困难的母亲……”启发我振奋精神，为了解救中国千百万受难的母亲，力求上进！

我们的班主任叫罗雨时，是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长，有次他宣布要在学校发展“三青团”组织，要我们积极参加，并决定那个星期天去郊外照集体相，我便于星期六课后后躲到雷家去了，星期日晚上才返校。因此，他非常忌恨我。一天学校传来一个消息：“一家大恶霸地主被土匪抢劫后，杀光了全家……”全校大呼，议论纷纷。我在周记上写道：“总是作恶多端，方才有此下场。”他的批语是：“你有偏见。”其时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时期，反动派还不敢公开把我们怎么样，只是暗中监视而已。紧接着，学校来了一个女童军教官（实际是女特务），加强了对学生的管制，还搞了一次突击性的大搜查，把学生隔离到别处，由他（她）们翻箱倒篋地细心检查，但扑了个空，一无所获（我们早有准备，把信件、书籍转移出去了）。过后，罗雨时找我个别谈话，叮咛我：“你不要误入歧途。”同时把蒋介石的“言论集”给我阅读，想从思想上征服我。我为了想在此校把初中念完，也只好虚与委蛇。把所谓“言论集”的序言死记硬背下来，在他又一次找我谈话时，我便照本宣科，侃侃而谈，不但蒙混过了关，还受到了他的表扬。

1939年秋季开学，罗雨时要我找保人，否则不准入学，

我找同学周汝琪（她哥哥在党部工作）作保，五哥寄来的信和书都全部寄存她家。开学后，形势愈来愈紧张，蒋介石逐步地重施反共故伎，风言风语充斥全校，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危险，很有被抓的可能。乃借故请假去成都请教五哥，他说：“走为上策，立即行动。”我赶回学校匆忙收拾行装坐黄包车离校。刚出大门，罗雨时嗅到气味追来了，但为时已晚。仅在车后大叫：“王家华，你不要误入歧途。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催车夫快跑，才算脱离了险境。到成都，寄住在一个地下党员毛念生的家里，五哥托人介绍进了一个声称为战地服务的护士学校学习，定期三个月结业分配。校址在法国驻蓉领事馆，主持人是一个姓车的留法博士。快满三个月时，同学们听到分配后的月工资，只有银元2元，与招生简章上说的每月8元大相逖庭，于是七嘴八舌地吵开了。我鼓动说：“我们给车博士写抗议信，要他照章办事，如果不行，我们就趁早解散回家。由我喊口令。”大家都同意。由我执笔写成抗议书，塞进车的宿舍。第二天上课，他果然大发雷霆，破口大骂。于是，我喊口令：“起立，向后转，开步走！”大家一哄而散。等他叫来警察，连人影也找不到了。至此，我又再次沦于失学、失业的状态。事后，被五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批评我不懂得斗争策略。随即将我寄居在一个姓王的老太婆家里。正值天寒地冻，我衣服单薄，时不时地又交不上伙食费，真的是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当时地下党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靠组织或个人设法找职业作掩护搞工作，同时也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盘踞山西多年的军阀阎锡山，与蒋介石是貌合神离，随

时都防备“中央军”把他吃掉。当时日寇的魔爪伸到了山西的边沿，蒋介石对他也是虎视眈眈，于是他曾一度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当然这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成效。党中央派去了若干党员干部到山西工作，薄一波同志全面负责。帮助他办起了“民族革命大学”，招收、培训革命知识青年，充实抗日力量。1939年夏天，“民大”派到成都招生的负责人是中共党员陈恕平。成都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遵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通知已暴露了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报名投考“民大”（其时蒋介石又挥舞屠刀，镇压革命力量，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藉以保护革命干部和保存革命力量。直到12月份，这支以“民大”新生名义组成的行军队伍才组织就绪，按军事编制编成一个大队，共152人。大队长陈恕平，副大队长王家广，政治指导员王怀安（三人都是中共党员）。下设四个中队，一、二、三中队是男生、四中队是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此时更名王皓（以下简化为皓）。我学过几天护士，编入卫生组，每天背上药包行军，每到宿营地，少不了给感冒了的发阿司匹林片，给脚上打了泡的人抹碘酒、红药水。

我们是12月8日从成都出发的，1940年2月2日才到达延安，行军57天，行程3000里。在这57天3000里的行程中历尽了艰辛。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了许多“三青团招待所”。如果发现了单个或少数几个青年往西北方向走，就被抓去关押，然后押送回大后方。我们是阎锡山“民大”的新生，是到二战区去的，他们当然不敢阻拦，但也暗中刁难。不是不解决住地，就是不给粮食，我们有时就挨着饿露天宿营。吸取了教训后，大队抽人组成了“前站队”，提前出发先到宿营地买菜、担水。

煮饭……，保证了队伍吃饱、睡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在途中，大队领导反复强调，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不要掉队，要互相照顾，否则，就有被抓去的危险。大家都遵守得很好，没有发生意外。可是这一百几十人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头天才走20里，以后里程虽然略有增加，但进度仍不理想。后来领导研究决定，行军一周，休息一天，打“牙祭”一次，并由“旅外剧团”表演节目活跃生活。这样一来，愈加巩固了行军的饱满情绪。1939年12月底，传来了山西发生新旧军冲突事件的消息，这是阎锡山发出的反共反人民的信号。因此队伍到了咸阳，即由大队领导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党中央。党中央通过办事处传达指示：“将全部人员带到延安。”同时一再叮咛：“要周密考虑，防备阎锡山搞突然袭击。”阎锡山果然也消息灵通，我们在咸阳休整，就派来了一个姓牛的中队长带了三个武装随员来“迎接”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来监视我们的。

大队领导经过周密计划，与陕甘宁边区驻山、陕交界处的边防部队取得联系，我们到茶房镇后将改道去延安，请他们接应。并秘密地向队伍传达命令：“到茶房镇不解行李，不睡觉，听候指示。”并补充说：“如果有行动，对有病的同志要搀扶着走，坚决不要丢下一个人。”同时给每人发了一块银元，万一被打散了，就作路费往延安方向走，会有人接应我们的。当天到茶房镇已近黄昏，吃了饭，天黑了，队长集合好队伍，也把牛队长请来，由指导员王怀安讲话：

“同志们，阎锡山反共反人民，新旧军打起来了，这是真的。现在那里（指山西）变得黑暗了，反动了。我们是到黑暗反动的地方去呢，还是到革命的、光明的延安去？大家

异口同声地大喊：“到光明的延安去！”这吼声震动了山谷，震破了寒冬的黑夜！我顿时热血沸腾，真个是喜极欲狂了。大队长（他是山西派来招生的）当即表态：“我跟同志们一道走。”当时牛队长等人气急败坏，呆若木鸡。王怀安指导员命令队伍向左转，152人成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向边区甘泉县进发。只听得嚓、嚓的脚步声，跟上跟上，不要掉队的口令声，几乎是小跑前进。经过通宵的急行军，六十里路黎明前到达。我们在甘泉县休息了3天后继续前进。在中途，共青团中央负责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前来迎接、慰问我们。在一个草坪上他给我们讲话：“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了自由的空气，带来了党中央的慰问……”大家听了，兴奋得跳了起来，把帽子抛向天空，唱着，跳着……许久未能平静。1940年2月2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把我们安排在北门外新华书店礼堂住宿。团中央冯文彬同志、大作家丁玲大姐……还有许多负责同志络绎不绝地来看望我们，我们一直沉浸在兴奋、欢乐中。

永远眷恋在延安的岁月

中央组织部将我们这批人分别安排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等校学习深造。女同学大部进了女大，我分到七班。女大是毛主席提议为中央妇委主办的，是我国第一个为妇女解放运动培养骨干的学校。校长是王明，副校长是柯庆施，下设政治处、教务处、干部处、总务处等办事机构。在“女大”主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增强党性决定》等。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还经常听毛主席的讲话，周总理、

叶剑英、范长江、艾思奇等也不时给我们作形势报告。我们的课堂是露天，坐在地上，膝盖就是桌子；住的是窑洞，十个人睡一个大炕，垫的谷草，点煤油灯；吃的是小米饭、大白菜、洋芋，一个星期吃一次肉，吃白面馒头；穿的是土布做的棉衣、单衣，一年各发一套。国民党反动派调胡宗南30万军队严密包围封锁边区，军民生活都很艰苦。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女同志纺纱、织布，我学会了纺棉纱，还纺出了一等线。我们每人每月发边币1.5元，精打细算地使用，交党费、买牙膏牙刷、买卫生纸后还要剩点钱共同凑集去青年食堂吃“三不粘”（是面粉掺鸡蛋、糖，用油炸成的，是当年最高级的食品）。大家还风趣地抢小米饭锅巴，戏称它叫“列宁饼干”。我最感到伤脑筋的是鞋子最易穿烂，我又不会做，后来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来解决，去拾别人丢掉的烂鞋，只要底子是较好的，把它洗干净，剪掉破帮，再缝上几块布条拴上线索就完成了凉鞋，穿起来还顶高兴。

在班上，指导员和我们，我们同学之间，关系很好，融洽、亲切，互相关心、照顾，像一家人似的温暖、幸福。在领导的教育辅导下，我进步较快，二月进校，五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8月就转正了，我成为班上的宣传骨干。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大家精神愉快，每于课余饭后或节假日，同学们常去附近桃林里玩，聊天、打扑克，四川人聚在一起就摆大后方的小吃，说得津津有味，我们叫它为“精神会餐”。学校文化生活也很活跃，每周六都要组织友谊舞会或组织球类比赛。1940年“三八”节，每人发了一套灰土布做的领口袖口嵌上白布边的“列宁装”，穿着它参

加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后在操场跳集体舞，场面壮观、同学们高兴极了。

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女同学特别关心。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露天场上吃饭，毛主席来了，亲切地询问我们吃得饱吗？菜够不够？一星期吃几次肉？生活习惯吗？啊！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同学们兴奋极了，饭也顾不上吃，抢着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把毛主席围在中间，跳跳蹦蹦，轰动了起来，齐声向他问好。此情此景，而今记忆犹新。1941年11月我们在女大毕业了。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生活了一年多，幸福祥和的学校生活就要结束了，姐妹们就要分别了，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难受，彼此依依不舍，泪流满面。我被分配到甘肃省陇东分区庆阳小学教书。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而今半个世纪了，为了祖国母亲，为了人民大众，坚决响应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风风雨雨，奔波在神州大地的南北西东。

编后话：

王皓同志是我们县参加革命较早的同志之一。尤其是女同志，在那个时代能毅然投身革命斗争，就更难能可贵了。希望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们，在阅读了王皓同志撰写的这篇亲身经历的文章后，能从中悟出点什么来。

文章只写到延安女大毕业分配工作止。在此，我们再对她以后的革命生涯作一简介，让读者们对王皓同志能知道得更多一点。

40年代前期，基本上都是在西北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后期则调去北方搞教育工作和行政工作。50年代起迄至83年，几乎没有离开过西南地区。先后任过西南妇联宣传教育科长，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南大区留